

首届“费孝通田野调查奖”获奖文集

当代中国 田野观察

(2017)

Field Observation on
Contemporary China

(2017)

国务院参事室社会调查中心 /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首届“费孝通田野课”

当代中国田野观察

(2017)

Field Observation on Contemporary China
(2017)

国务院参事室社会调查中心 /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田野观察. 2017 / 国务院参事室社会调查
中心编.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7
ISBN 978 - 7 - 5201 - 2789 - 9

I. ①当… II. ①国… III. ①社会调查 - 中国 - 文集
IV. ①D66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3614 号

当代中国田野观察 (2017)

编 者 / 国务院参事室社会调查中心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谢蕊芬

责任编辑 / 谢蕊芬 马甜甜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学出版中心 (010) 59367159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8.25 字 数: 477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2789 - 9

定 价 / 1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而“民之所望，施政所向”则是政府决策的根据。要贯彻落实好党和政府的这一要求，就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及时了解人民群众的期待和诉求，搞清楚我们社会的问题所在，从而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

国务院参事室社会调查中心的宗旨是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收集和反映社情民意，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就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向决策层反映实情，提出建议。2016年11月，国务院参事室社会调查中心会同新华网、中国青年报、新浪微博、腾讯网联合发起了以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名字命名的首届“费孝通田野调查奖”征文活动，旨在“认识社会、认识中国”。

此次活动倡导和推动社会各界人士，到现实生活中去，到人民群众中去，发现和描述社会的发展变化，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这次活动，首先是一个征集社情民意的行动，其次也是一个公共政策的众创行动，这不但是资政的需要，也是存史的需要。本次活动征文的对象非常广泛，面向社会各界人士，征集作者近期经过田野调查所写的“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聆听”的“三亲”文章，描述我国城市和乡村、企业与机关人们的生活、工作情况以及所思所想，体现作者的观察和思考。

此次活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和积极参与，各界人士踊跃投稿，我们共收到征文4000余篇。经过初筛，特聘专家小组审评，专家委员会审定，以及学术原创性检测和社会公示。首届“费孝通田野调查奖”共产生一等奖3篇，二等奖6篇，三等奖10篇，优秀奖12篇。这些获奖文章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当

前城乡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和改革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总结了一些鲜活的经验和做法，也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及建议。我们现将 31 篇获奖文章编辑成册，出版发行，以飨读者。

作为国务院参事室的一个动员组织社会力量调研国情、倾听民声、汇聚众智的公共政策众创平台，我们决定将“费孝通田野调查奖”征文活动延续下去，每年举办一届。我们要不断总结经验、完善组织和评奖方式，使活动有更广泛的影响力和更高的质量。

国务院参事室社会调查中心

二〇一八年三月

目 录

红村中的中国贫困削减叙事：2004—2017

..... 陈前恒 冷晨昕 程 竹 方 航 张靖娜 史宏达 / 001

政府与市场的分工界限应如何划分：一个田野调查研究 周绍东 / 027

三峡移民生计变迁与转型

——以肇庆大旺移民村为例 戴 群 / 063

农民工民俗“反哺”行为与乡土文化认同研究

——以川中地区 BM 镇调查为例 谭富强 / 103

乡村旅游开发中的农民参与和收益分配

——以福建省 YD 镇为例

..... 邱子舒 沈明宏 王嘉凡 周天齐 刘若非

王丽华 李晓晓 李 婷 / 112

“城市病”，还是城市新生？

——特大城市城中村地区流动人口社会治理 任 远 / 136

乡村治理模式创新与实践

——广东省 YF 市自然村乡贤理事会调研思考 吴天龙 刁银生 / 156

定州行

——定州农民合作社剪影 何钧力 / 165

江村调查散记 魏永刚 / 179

YJ 村农业供给侧艰难曲折的自发变革与农民的困惑	黄兴年 / 193
中西部农村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困境	
——基于赣南 S 村的乡村调查	雷望红 / 207
困境下的动员：对溪村村民动员的人类学考察	黎人源 / 215
关于河北宣化地区冥婚的田野调查及文化人类学阐释	顾春军 / 234
从小炉匠到非遗传承人：鹤庆新华村工匠群体的角色转变与	
文化自觉	杨 柳 / 254
农业经营方式变革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治理创新	
——基于 D 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调查	孙运宏 / 266
非公经济人士如何评价当前成长环境？	
——基于浙江省五市的调查研究	操家齐 / 275
流变的礼单：代际人情圈子的同与不同	
——一个农户礼单账册的代际比较	刘小峰 / 298
易地搬迁：在去和留的挣扎中突围	董 翔 / 317
穿过文字的阴影：两个文盲在广州	罗瑞霞 / 323
发展家庭农场，促进居村农民身份转变	吴业苗 / 334
吸纳性规制：宗族村高利贷行为的公共化及其运行机制	
——基于粤北 P 村蓝氏宗族的历史考察	李华胤 / 341
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市贯岭镇茗洋村革命老区考察报告	黄解民 / 353
以“人”为本：异地重建与文化保护的本体论再思	
——以灾后搬迁的羌族 MT 村为个案	尚 书 / 362
小承包迈向大经营	
——湖北襄阳市双丰收农机专业合作社土地托管模式	
调查	余爱民 李光河 何红卫 / 371

争议、避讳、创新：畚族图腾演绎田野考察报告

..... 王 晴 丁梦星 叶心怡 / 378

社会治理视角下嵌入新型牧区社区发展的多元主体联动机制研究

——基于对东乌珠穆沁旗的田野调查 王云龙 / 386

精准扶贫执行的新风险与乡村治理 赵启琛 / 396

灵岩山寺佛教安养院寺院养老调研报告 齐腾飞 / 402

新平戛洒花腰傣竹编产品现状的田野调查及其对策思考 任晓波 / 419

构建多元服务保障网络，为农村老年人生活保驾护航

——S 镇农村老年人生活面面观 张宏魁 / 429

“我们穷人也有钱看病了”

——甘肃省 QA 县“两保一孤”大病保险试点的

调查 强宏斌 卢天如 / 437

红村中的中国贫困削减叙事：2004—2017

陈前恒 冷晨昕 程 竹 方 航 张靖娜 史宏达*

本调查报告使用的资料来自众多人员在 2005—2017 年的收集整理。除了本调查报告执笔人外，他们是：张晓山、杜吟堂、崔红志、龚晶、梁信志、曹新星、许志超、沈冯娟、马宁、李力、吕之望、李军培、梁娜、程晓东、孙瑞萍、李秘、郝然、郭淑静、田笑菲、柯平、郑坤、陈舒鹏、赵芸、张正男、王浩、池桂娟、曲直、赵殷玉、郭晶晶、王莹、肖亦天、陈克强、梦丹娜、陆雨晴、王天仪、李萍、王珊珊、赵天琦、胡林元、徐诗纯、职嘉男、田梦杰、魏文慧、陆沛莹、刘今、权彦龙、李军、曹作兰、项文丽。对他们表示感谢！

如果没有红村村民的支持，完成这个调查报告是不可能的。随着我们去红村的次数越来越多，和我们成为朋友的村民也越来越多。我们重点感谢以下村民：权平、张兴平、李有平、张元新、张新荣、汪发录、雒万祥、吕志荣、汪根生、汪爱军、王晓荣、李世雄、张兴民、王启红。

一 引言

进入 21 世纪，中国发生了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比如，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载人航天领域佳绩不断；高速铁路快速发展；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互联网+”理念渗透到各行各业。这些事件正在并将继续影响近 14 亿中

* 作者简介：陈前恒，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冷晨昕，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程竹，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方航，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张靖娜，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史宏达，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国人的福祉。然而,在我们看来,中国贫困削减取得的成就同样令世界瞩目。

依据《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按照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扶贫标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人减少到2015年的5575万人,减少了92.8%;同期农村贫困发生率从97.5%下降到5.7%,降低了91.8个百分点。中国的贫困削减为世界贫困人口的减少做出了巨大贡献。按照2011年购买力平价1天1.9美元的贫困标准,1981—2012年,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了11亿人,同期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7.9亿人。中国减少的贫困人口占全球减少的全部贫困人口的71.82%。^①

与使用宏观数据向世界展示中国贫困削减创造的奇迹相比,我们则基于一个贫困村庄10多年的跟踪观察资料对中国贫困削减的宏大叙事进行微观表达。尽管村庄个案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适合其他单位,但个案研究的方法也有它的独特之处。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对这样一个小的社会单位进行深入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单位。但是,这样的结论却可用作假设,也可以作为在其他地方进行调查时的比较材料。这就是获得真正科学结论的最好方法。”^②

这个贫困村庄叫红村,是中国西北地区一个普通的山区村庄。21世纪以来,它和中国其他12.8万个贫困村庄一样,正经历着巨变。根据政府的计划安排,这个村庄将于2020年实现脱贫。因此,本调查报告将记录这个村庄在贫困削减方面取得的成就,说明成就取得的原因,反思贫困削减中存在的问题,对今后的贫困削减工作提出建议。通过对一个贫困村庄的深入实地的调查,对当前中国贫困削减问题的宏观研究是一种必要的补充。

二 红村调查进入与跟踪

2005年7月中旬,中印农村社会保护比较研究课题组一行7人到红村进行田野调查。^③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了与红村的亲密接触。从事农村田野调查,一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扶贫开发报告课题组:《中国扶贫开发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载李培林等编《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②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6,第26页。

③ 中印农村社会保护比较研究课题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研究员主持。本调查报告主要执笔人陈前恒参加了这次田野调查,并主持了此后的跟踪调查。

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村落进入问题。费孝通先生进入开弦弓村调查主要利用了他姐姐与村落的私人关系。^①近30年来在关于村落的研究中，进入村落的方式主要通过行政渠道和私人关系的安排。张文宏、黄先碧专门研究了行政资源介入在田野调查中的作用，他们认为行政资源介入对于顺利完成调查是不可缺少的，但与此同时，行政资源的介入经常影响到获取调查资料的真实性。^②为了能够顺利进入红村开展田野调查工作，课题组运用了一定的行政关系。在红村调查中，笔者深深地感受到行政关系对田野调查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如果没有县、乡、村干部的支持，调查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然而，县乡干部的陪同，又让我们感到很多农户在回答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时没有客观地反映情况。田野调查中的这些问题让我们深深地意识到，要比较客观、深入地对村落中的一些问题进行研究，首先要与村干部、村民做朋友，然后才有可能获取到比较客观、真实的一手资料。此次调查对红村所有在村的农户进行了普查，大约持续了一个星期。^③

我们觉得课题组获得的资料相当珍贵，于是萌生了一个想法，即通过对红村进行长期跟踪观察，记录一个贫困村庄和它的村民们在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变迁。2008年7月，一行9人对红村在村农户进行了第二次跟踪普查。村庄调查问卷的设计沿用了2005年开展的调查问卷的大部分内容，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在于保证调查研究具有很好的连续性。2010年和2012—2017年，我们对红村又进行了7次农户跟踪普查。由于在2005年的调查中，我们与红村村民建立了比较好的私人关系，此后的跟踪调查没有借助行政力量，确保了调查的独立性。在跟踪观察中，我们克服了没有研究课题资助、村庄道路泥泞、少部分农户拒访等诸多困难。通过调查研究，很多村民和我们成了朋友。朋友多了，幸福就来了。

三 红村：中国西北的一个贫困山村

红村是位于中国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北部一个中等规模的山区村庄，距离

①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6，第40页。

② 张文宏、黄先碧：《调查中的行政资源》，载边燕杰、李路路、蔡禾著《社会调查方法与技术：中国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127—160页。

③ 关于此次调研的背景和调研成果见张晓山等著《中印农村社会保护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此次调查的结果多反映红村农民在2004年的生活情况，故把2004年作为记录红村变迁的起点年份。

县城 13 公里。定西市位于甘肃省的中部，人们常用“苦脊甲天下”来形容定西人民的生活状态。定西市到渭源县的公路沿着大山蜿蜒而行，公路两边的大山上布满了农民的梯田，这些梯田耕作是农民的重要生计来源。人口的不断增长促使人们加大了对大山的开发力度，即使是山的最高处也被人们开发成梯田。梯田的开发破坏了当地的植被，水土流失问题也随之加剧。根据定西市气象部门发布的数据，这里年降雨量在 300 毫米左右，属于严重的缺水干旱地区。与此同时，定西市还经常遭受雹洪、沙尘、地震、霜冻等自然灾害的袭击。由于生态环境比较恶劣，定西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在甘肃省处于低端水平，还有很多农村人口处于贫困状态。

渭源县地处定西市的中西部，该县因渭河发源于其境内而得名。渭源县东西长 60 公里，南北宽 56 公里，土地总面积 2065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80.06 万亩，最高海拔 3941 米，最低海拔 1930 米。渭河贯穿整个县域，以渭河为分界线，渭源县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几个亚区域：渭河流域北部为黄土梁峁沟壑区，干旱少雨，植被稀少；渭河流域中部为浅山河谷地带，气温温和，土壤肥沃；渭河流域南部为高山地带，高寒阴湿。由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渭源县是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

2017 年，红村共有 248 个户籍在村的农户，约 1100 人。然而，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一些村民到城市务工并在城市定居下来。所以，村庄中的常住人口只有 215 户 1000 人左右。这里“十年九旱”，地表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干旱、雹洪、霜冻等自然灾害频繁，恶劣的生态环境威胁着当地的农业发展。由于经济比较落后，红村被国家认定为“贫困村庄”。

红村共有耕地 3229.1 亩（大约 215.3 公顷），多为山坡梯田，以旱作为主，人均耕地 2.98 亩（大约 0.2 公顷）。种植业中，党参、当归、黄芪等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约占总播种面积的 60%；以小麦、玉米为主的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约占播种总面积的 30%；胡麻、大麦、牧草等作物的播种面积约占总播种面积的 10%。农户可以自由出售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大部分农户在家门口等着商贩上门收购农产品，少部分农户会把农产品运输到县城的市场进行出售。来自党参、当归等中药材的收入约占大部分家庭收入的 30%，在一些家庭中这项收入甚至能够占到家庭总收入的 80%—90%。

村里有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分支组织。该组织拥有 20 多名党员，其中党支部

委员有5人，包括1名党支部书记、1名副书记和3名委员。党支部是村里的最高领导机构。村里还有一个由村民每3年一次进行直接选举产生的村民自治委员会，负责村庄经济发展和公共事务。村民自治委员会由5人组成，包括1名村主任（兼党支部副书记）、1名村文书和3名委员。为了监督村民自治委员会的工作，村里还成立了监督委员会，包括1名监督委员会主任和2名委员。2016年，村党支部书记、村自治委员会主任和文书从政府那里获得了每人12000元的补助；监督委员会主任从政府那里获得了4000元的补助。

与中国华北平原或长江三角洲农村地区的村庄相比，西北地区农户居住得比较分散，聚居规模要小得多。通常，聚居在一起的农户从几户到十几户不等，聚居的单位被称作“庄”。红村一共拥有24个庄。同一条山梁或同一条山沟的几个“庄”又形成一个社（村民小组）。目前，红村一共有6个村民小组，即汪家山村民小组、后岔村民小组、方家梁村民小组、羊角湾村民小组、高咀村民小组和豆家岔村民小组，这些村民小组分别拥有3、5、4、3、4、5个庄。每个社有一个由村民选举出来的社长，每个社长每年从政府那里可获得3600元的补助。作为土地的集体拥有单位，一个社的农户需要商讨决定土地分配或调整事宜，还常常需要商讨有关社里的公共事务，比如公共产品提供，危房改造户、低保户或贫困户认定事宜等。此外，一个社的农户还在生活领域中互相帮助，比如全社人集体参与红白喜事等。总体上，一个社的农户之间存在比较多的社会交往，但比庄内农户的交往、互动强度要低一些。由于各村民小组间的距离比较远，不同社之间的村民往来并不密切。一个农户遇到红白喜事，本社农户都会参加，但除了具有亲戚或较好的朋友关系的其他社农户，其他社的农户不会参与。不同社的农民尽管都互相认识，但见面也只有“点头”之交，没有更深入的交往。

四 红村中的贫困削减成效

（一）村民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绝对贫困基本消除

联合国在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中写道：“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到

2020 年我国扶贫开发针对扶贫对象的总体目标是：“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为此，我们从粮食安全与食物消费、服装消费、住房、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等方面描述红村居民的生活变化。

1. 不愁吃目标已实现

获得足够的粮食是贫困地区农民的最基本需求之一。1978 年以来，中国政府实行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户平均分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村土地政策，这种土地制度为农民提供了获得粮食的最基本手段——家庭生产。红村土地承包始于 1980 年，先后实行了按组承包、第一轮按户承包、第二轮按户承包和土地确权。

1980 年，红村实行按社（生产队）承包，即全村 6 个社，分成 19 个组。其中，后岔社分为 5 个组，羊角湾社分为 3 个组，高咀社分为 3 个组，豆家岔社分为 3 个组，汪家山社分为 2 个组，方家梁社分为 3 个组。原 6 个社的土地、牲口、集体生产工具，以及公购粮交售任务等，都按各组的人口数量，由社分摊到下属各组，各组完成公购粮交售任务以后，剩余的粮食和现金在组内按个人的劳动工分进行分配。

1981 年，实行第一轮按户承包，具体承包办法是：除原各社分给各户的自留地保持不变，仍由各户自己耕种以外，其他集体耕地在各社范围内按地块分为 3 个等级（方家梁生产队分为 5 个等级），按人口（大人、小孩都一样）平均分配到各户，然后再由各户自行调换成连片地。土地承包前的自留地，1979 年全公社统一按平均面积进行过一次调整，1980 年开始土地承包以后一直没有动，也没有记入各户的承包面积内，延续至今。1981 年全村人均承包面积为 4.81 亩。各生产队的饲料地（苜蓿地）也按人口进行了承包。第一轮承包期限规定为 15 年，到 1996 年止。

1992 年，红村进行了一次土地大调整。当时规定，人口减少的农户，按人均 4.81 亩的承包标准交回超额用地；人口增加的农户，按人均 3.76 亩的标准弥补缺额用地。交回的土地按中间等级为准，如果交回三等地，就要有一半是一等地。

不论是 1981 年第一轮承包，还是 1992 年调整，范围都是以原生产队的地界为准。土地承包以后，对各社（原生产队）的地界和各户的林权，都进行过一次调查登记，给各户颁发了林权证，其中对庄前庄后的零星树木，以及各户

划分的荒山荒坡、代管集体林地，都有株数、面积、四至、折价的详情登记。

1996 年全村开始第二轮土地承包，对 1992 年调整后的土地没有做进一步改动，并于 1998 年发放了全省统一的土地使用权证。2002 年税费改革以后又核实了一次。2016 年，村里进行并完成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表 1 列出了 2004 年和 2016 年红村居民通过家庭生产实现粮食自给的情况。2004 年，通过家庭生产能实现粮食自给的农户的比例为 38.70%；到 2016 年，这一比例下降到 27.96%。这种情况表明，红村农户粮食自给不足的情况比较严重，且在过去的 12 年中，粮食自给不足的情况变得更加普遍。

表 1 通过家庭生产实现粮食自给的情况

	单位：%	
	2004 年	2016 年
自给有余	8.03	6.45
正好	30.67	21.51
自给不足	61.3	69.04

然而，很多家庭粮食不能自给的原因并非耕地少或产量低，而是农户出于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的种植行为市场化。根据 2002 年的核实，红村的人均耕地面积为 2.98 亩。按复种指数 0.96，亩产 150 公斤粮食计算，红村土地的人均粮食保障能力为 429.1 公斤，并不存在土地保障粮食安全能力不足问题。由于种植中药材的长期平均利润率高于粮食作物，种植中药材的土地面积是不断增加的。2004 年，中药材种植面积约占总种植面积的 20%，而到 2016 年，这一比例上升到 35% 左右。

种植中药材和外出务工带来的收入为红村居民购买粮食提供了资金来源，因此，绝大部分红村人并不担心粮食不够吃的问题。2004 年，3.57% 的人担心粮食不够吃。到了 2016 年，只有 1.08% 的人担心这一问题。事实上，在村庄 10 多年的调查中，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村里谁家因粮食不够吃而挨饿的事情。由此可见，在红村，不愁吃或解决温饱问题的目标已经实现。

表 2 提供的调查数据表明，红村居民在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基础上，食物消费结构明显升级。与 2004 年相比，2016 年每天（或三五天一次）食用肉、鸡鸭、水果、鸡蛋等的农户明显增加。但是，对鱼虾、牛奶的消费水平比较低。

表 2 红村家庭对相关食物的消费情况

单位：%

2004 年						
	天天消费	三五天 消费一次	十天半月 消费一次	一年半载 消费一次	逢年过节 消费一次	从不消费
豆制品	2.13	10.11	25.00	25.00	35.11	2.65
肉	15.96	19.72	23.00	23.47	17.85	0.00
鸡鸭	0.00	0.00	0.00	19.40	56.72	23.88
鱼虾	0.00	0.00	2.38	6.35	49.21	42.06
蔬菜	54.17	33.80	11.57	0.00	0.46	0.00
水果	1.68	6.70	29.61	54.19	6.15	1.67
鸡蛋	5.46	30.30	36.37	12.12	7.27	8.48
牛奶	13.86	2.97	0.00	0.99	10.89	71.29
2016 年						
	天天消费	三五天 消费一次	十天半月 消费一次	一年半载 消费一次	逢年过节 消费一次	从不消费
豆制品	0.54	24.19	27.42	30.11	17.74	0.00
肉	38.92	16.76	22.70	10.27	11.35	0.00
鸡鸭	0.54	1.61	15.05	4.84	77.96	0.00
鱼虾	1.07	4.30	0.00	4.84	89.79	0.00
蔬菜	60.22	27.42	6.99	1.07	4.30	0.00
水果	11.83	27.96	32.26	19.89	8.06	0.00
鸡蛋	20.43	43.55	20.97	8.06	6.99	0.00
牛奶	0.00	0.54	15.05	25.27	59.14	0.00

2. 不愁穿目标已实现

红村人除了做一些布鞋和鞋垫以外，穿的衣服和鞋袜主要从县城的商店购买。随着收入的提高，村民每年购买衣服的次数和数量也逐渐增多。2004 年，每个农户平均购买 2.53 件衣服。2016 年，每个农户平均购买 7.14 件，增长了近 2 倍（见图 1）。表示衣服不够穿的农户比例大幅度下降：2004 年，23.66% 的农户表示衣服不够穿；2016 年，只有 1.61% 的农户表示衣服不够穿（见图 2）。这表明，不愁穿的目标也基本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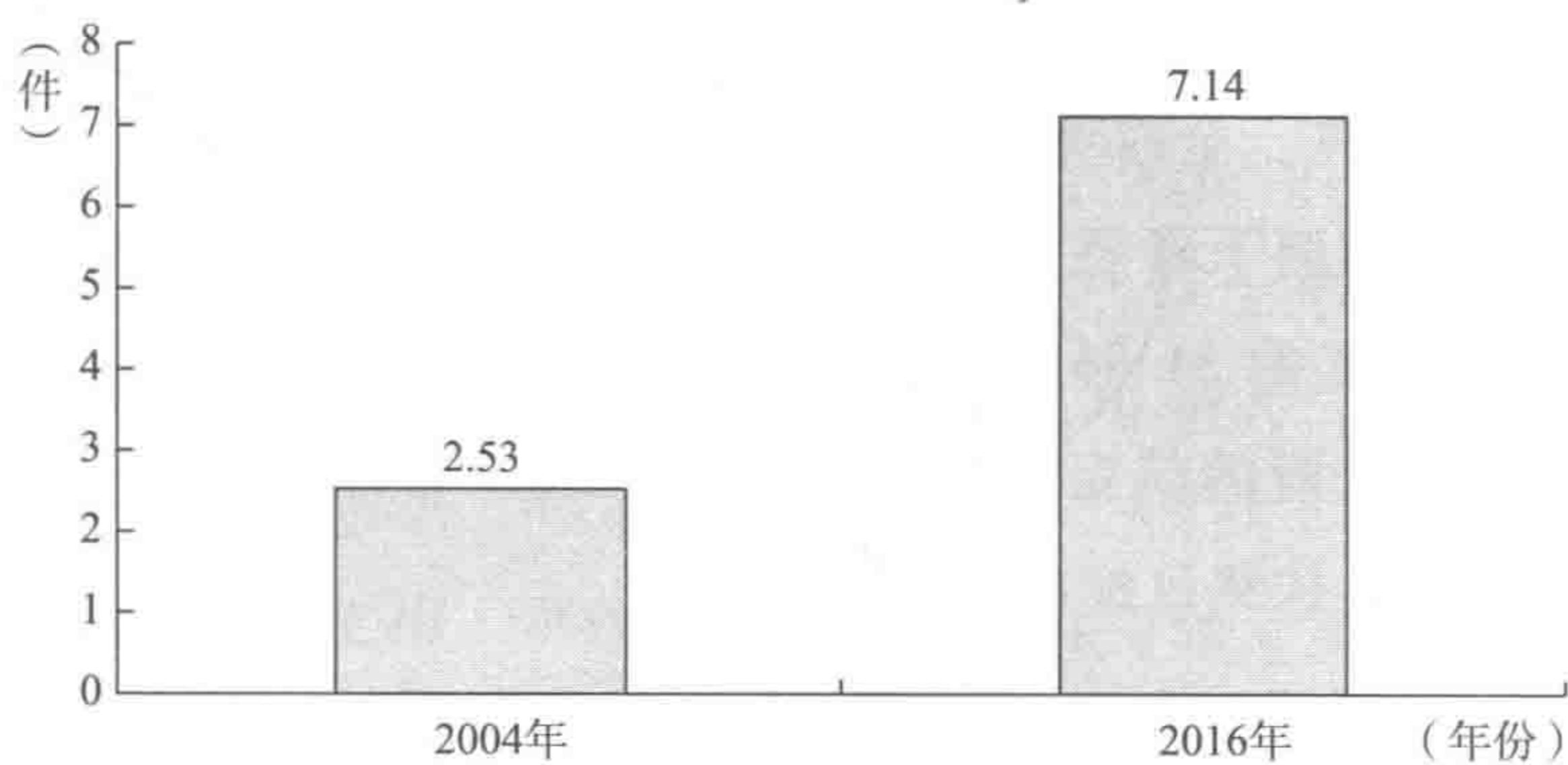


图 1 红村每个农户平均购买衣服情况（2004 年和 201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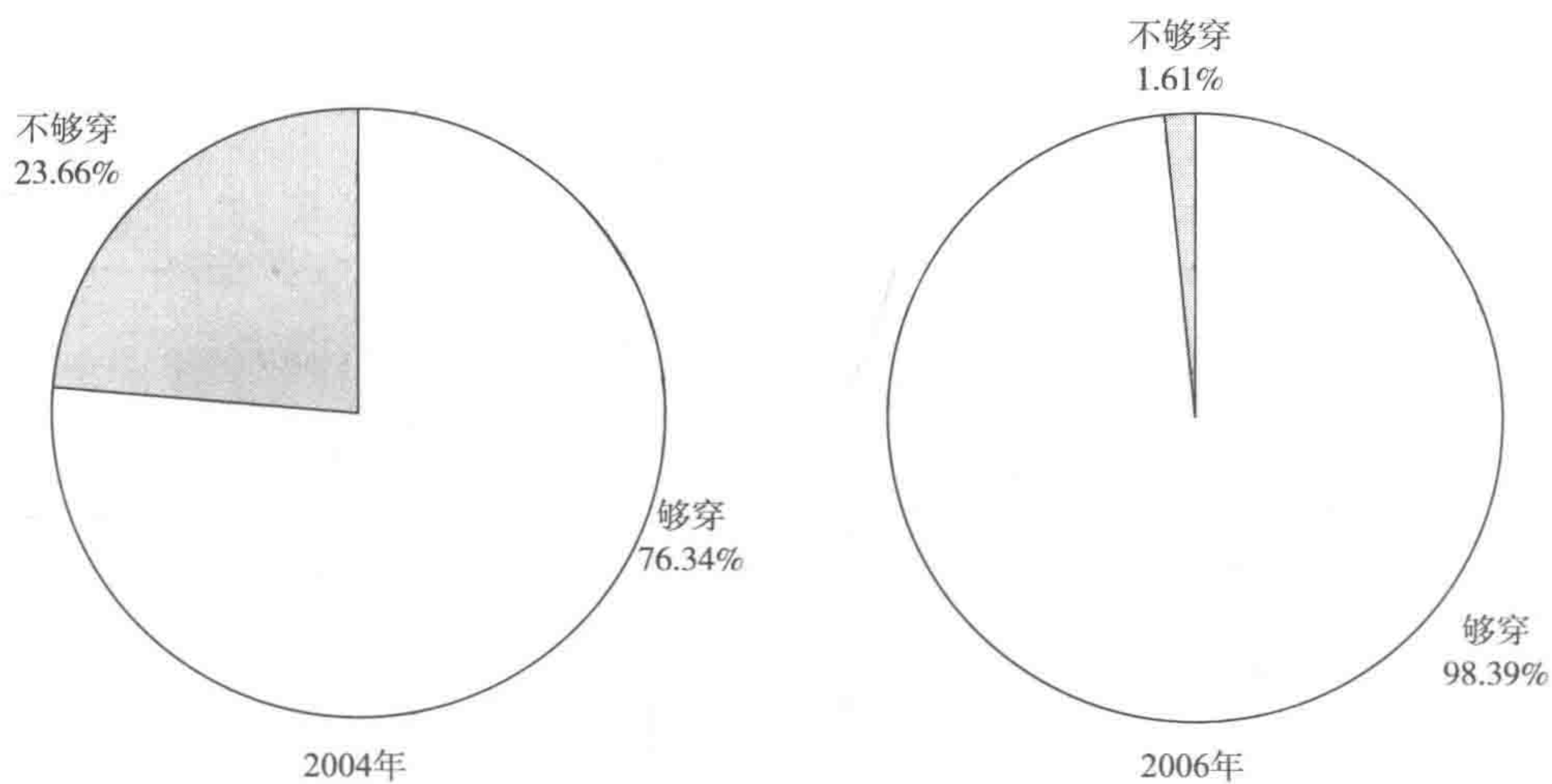


图 2 农户表示衣服是否够穿的情况（左、右图分别为 2004 年和 2016 年的情况）

3. 危房已经消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住房不仅具有遮风避雨的基本功能，还具有身份地位的象征意义。因此，中国农民历来重视自己住房的修建。根据目前中国执行的农村宅基地政策，只要拥有社区成员权资格，一个农户就可以获得一块拥有永久使用权的宅基地。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和以社区成员权为基础的农村宅基地制度，红村绝大部分农户拥有自己的住房。2004 年的调查表明，村中只有 1 个农户因为没有获批宅基地而暂时没有自己的住房。2017 年 7 月的调查表明，村中农户都拥有自己的住房。

但拥有住房并不意味着实现了住房安全，还需要看住房的质量状况。2004 年，全村没有楼房，72.43% 的农户住房为土坯房。随着经济收入的增长和政府